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五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一八期 ——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12e）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	魏楚雄
【往事如烟】	文革中的清华岁月	万润南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

• 魏楚雄 •

毛泽东通过群众运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斗争，它对中国及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象刘少奇、陶铸、贺龙等都未能忍受文革残忍的政治斗争而在文革结束之前就早早率先去世。许多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象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在文革中存活下来，但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式的看法已经非同昔日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受文革影响较少，因为在文革开始时他们要么刚刚在政治仕途上起步，要么还在较低的政治梯阶上努力攀登。然而，文革对这些年轻一代、特别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应该更加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已经统治了并将要更长时间地统治中国。对文革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进行系统整体地分析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更不要说文革对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影响了。但是，通过重点分析文革对当前中共第一号领导人胡锦涛的影响，本文将力图描绘出文革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影响的程度与方式，从而判断中国共产党现金及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

一、中共领导人的代层界定

通常学者们习惯于把自1949年以来的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四代。（1）这一划分是单单根据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和任期来决定的：毛泽东年代、邓小平年代、江泽民年代和胡锦

涛年代。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对领导人资历和提升的审核是不一样。在毛时代和毛时代后，所有所谓的“干部”是指那些在政府和政党机构、组织及国家企业工作并领受国家工资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教师、技术员、公务员等等。（2）在地方和地区层面的中共干部将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中所谓的“中共领导”是指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如果把参加革命及提升到中央政府或中共中央职务的年份和年龄作为标准，中共领导人实际上可以被分为以下四组—早期领导人、长征干部、抗战和解放战争干部和新中国干部：

第一代：1900 年以前生，1927 年以前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1997 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第二代（82 岁以上）：1915 年以前生，1937 年以前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1997 年）：杨尚昆，90 岁；薄一波，89 岁；宋任穷，88 岁；张震，83 岁；洪学智，84 岁；习仲勋，84 岁；张爱萍，87 岁；叶飞，83 岁；萧克，89 岁；谷牧，83 岁；王鹤寿，88 岁；（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乔木，余秋里）

第三代（71—81 岁）：1915—1936 年生，1937—1949 年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1997 年）：刘华清，81 岁；万里，81 岁；宋平，80 岁；杨白冰，77 岁；吴学谦，76 岁；陈慕华，76 岁；杨德中，74 岁；赵紫阳，78 岁（胡耀邦，姚依林）

后期：江泽民，71 岁；乔石，73 岁；邹家华，71 岁；王汉斌，72 岁；任建新，72 岁；叶选平，73 岁；李鹏，69 岁；李瑞环，63 岁；朱镕基，69 岁；丁关根，68 岁；田纪云，68 岁；钱其琛，69 岁；李岚清，65 岁；姜春云，67 岁；李铁映，61 岁；尉建行，66 岁；黄菊，59 岁；谢非，65 岁；张万年，69 岁；迟浩田，68 岁；傅全有，67 岁；于永波，66 岁；王瑞林，68 岁；王克，66 岁

第四代（54—70 岁）：1927—1943 年生，1949—1965 年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1997 年）：胡锦涛，55 岁；吴邦国，56 岁；温家宝，55 岁；王兆国，56 岁；李铁林，54 岁；刘淇，54 岁；李继耐，55 岁；徐才厚，54 岁；姜福堂，56 岁；高严，55 岁；陈奎元 56 岁

有些学者如 Joseph Fewsmith 宁愿把中共领导人划为两组：革命年代领导人和非革命年代领导人。（3）本文将使用传统的划分法以便方便讨论，但也将分析中运用 Fewsmith 的划分法，因为他的划分反映了中共领导人代与代之之间特点的实质性不同。

二、文革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构成的影响

文革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中共领导阶层。首先，它大大加速了中共领导权从第一、二代向第三、四代的过渡。文革打断了中共内部正常的权力过渡。刘少奇和林彪等许多中共资深领导人的过早死亡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继承危机。毛泽东的恋权及其对“四人帮”和周恩来等人的不信任又延长了权力的过渡，这导致了中共领导人的年龄老化。及至文革结束，许多第一、二代的中共领导人要么过世了，要么已太老，不能在政府和党内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为第三、四代领导人打开了提升的方便之门，为他们快速获取权力而让路。

而且，毛时代刚结束后的权力斗争也造成了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快速崛起。在与华国锋即所谓“凡是派”的权力斗争过程中，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把第三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提升到该处。同时，由于文革因忽略经济而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巨大失败，中国共产党内部达成共识，决定把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而非政治运动作为党务的新方向。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来担任各阶层的领导职务。中共中央通过的让领导干

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决定使得邓小平能够加速把权力从第一、二代过渡到第三、四代的过程。权力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到第二代领导人的转换用了三十年左右，而从第二代领导人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权力转换只用了几年。结果，至1985年，第三代中共领导人构成了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大多数及多半的地方省市的官员。

文革还改变了“太子党”即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们的命运。他们的政治前途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如果文革没有发生，“太子党”很容易就会构成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的主体。然而，文革破坏了他们轻而易举的发展，使得他们中间很多人不能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野心和仕途。在文革中，他们要么一落千丈地变成了“狗仔子”并遭受巨大的折磨，要么对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及革命家庭的生活变得及其失望。他们中不少人没有被文革的种种折磨所压倒，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在如何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的问题上已经产生了新的看法，他们的观念与毛泽东思想及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已迥然不同。“太子党”中还有许多人因为父母的政治错误而完全失去了政治前途。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其父母于文革后官复原职后而恢复了政治地位，但他们已失去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兴趣和信仰，并对政治生活产生反感。他们中不少人下海经商，变得相当腐败。结果，“太子党”中作为在省级和中央级政权继承者的合格者急剧减少。这样一来就为提升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官员铺平了道路。

三、文革及其对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特点的影响

Joseph Fewsmith 把中共第一、二代领导人归为一类，称其为革命的一代。这一归类是比较准确的。Fewsmith 指出，“无论是毛泽东领导的还是邓小平领导的革命的一代具有非凡的自信。这种自信产生于他们多年参与所有各种问题的政治活动以及广泛的认同即革命胜利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4〕确实，这些革命老手是叛逆者和斗士。他们大都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革命活动的训练。他们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关注政治理想和原则胜于其他一切，并为此追逐一生、投入毕生经历。他们是为思想意识形态所驱使，愿意为其信念而甘冒风险。他们清廉、自律、道德观念强。他们有激情、有领导魅力。他们目标明确、政治性强。他们本身是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产儿、所以喜欢大规模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毛认为必要的话，他就能把整个国家投入文革的大混乱中。这也是为什么邓能斗胆发起离经叛道的经济改革、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革命的一代是通过军事和政治斗争获取政权，他们不必担忧他们统治的合法性。除了利用公开露面释放一种政治信号以外，他们很少化时间在提高自己的公共形象上面。他们的革命经历就是他们的政治资产。他们的集体领导是由他们的革命经历和革命贡献自然发展起来的。

而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则大都受到自然科学的教育及和平时期管理体制的训练。邓路线的对以思想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四人帮及凡是派的胜利决定了技术官僚将治理中国。技术官僚具有经济技术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但他们通常没有胆量采取大胆行动和寻求轰动效果。他们也没有了了不起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小心翼翼、努力工作来获取提升。正如 Joseph Fewsmith 所指出，“文革的教训之一是匆忙推行的庞大思想会导致灾难。”这一教训使技术官僚对任何导致剧烈变化的政策望而生畏，更不用说“工程师们是被解决具体问题的技巧而培养出来的”，“他们倾向于怀疑思想意识形态式的、博大的生活态度。”〔5〕他们意识到经济必须是首要党务。要不然，他们会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缺乏政治资本但富有管理工业和经济的经验。他们相信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喜欢使用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来保持社会稳定和进步。文革生动地向他们显示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在政治上保持谨慎的必要性，以及政治生存比政治正直更重要。因此，他们通常不会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显示很大热情。他们的政治立场经常是出自于对政治安全性和政治正确性的考虑而非出自于他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原则。更何况，他们长期在基层管理领域工作的经验教会了他们中共政权的政治文化以及通

过团体共识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们是教条思想意识形态倾向的、更灵活善变、更实际、更富有弹性的。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突然地退出政治舞台造成了一种在党政中央机构没有魅力型领袖和总司令的局面，这样就导致了“社团领导，”即权力被分散到更多人的手里。结果，第三、四代的中共领导人中没人能够单枪匹马地发起任何巨大变动。正如 Fewsmith 所描述的，中共非革命领导人“经由官僚途径和不得罪人的方法得到提升，”他们有限的经历和私人关系迫使他们“采取更加谨慎的、更注重培养共识的政治风格。”〔6〕不象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对群众运动既敏感又反感，因为他们个人的仕途几乎被文革的群众运动所葬送。虽然从李鹏的强硬保守派到胡锦涛的温和派对群众运动的反应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不喜欢群众运动。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给他们个人生活和国家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会用任何方法来管束群众，预防和制止群众运动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威。

“太子党”对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特点的形成关系密切。由于对政治仕途不顺及父母事业的失望，他们竭力设法弥补他们在文革中的损失。他们中许多人滥用了他们轻而易举得来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充分利用了由邓小平经济改革而带来的各种史无前例的经济机会。他们开始相信经济权力甚于相信政治权力。跟来自于普通家庭的、因缺乏政治保护而谨小慎微的干部不同，“太子党”在冒险利用新展现的经济机会时即野心勃勃又毫无顾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初级性给他们提供了充分利用这一不成熟体制的机会。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经济行为影响广泛而且感染性极大，最终导致了一种很快风靡全国的商业哲学和商业行为，即政治权力等于金钱。当这种商业哲学和商业行为主导了中国时，腐败变成了社会上无法控制的病毒及共产党内部的主要问题，它对中共权力、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一种严重威胁。在广义的意义上说，“太子党”的腐败是党内外普遍腐败的根源，这种腐败极大地削弱了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的权威并成为国家的瘟疫。

四、文革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胡锦涛

文革开始时，胡锦涛刚刚从中国数一数二的科技类高校清华大学毕业一年。毕业后，他留校在水利工程系当政治辅导员。〔7〕作为负责大学生政治教育和辅导大学生政治思想行为的高校党政机构的基层干部，文革使胡锦涛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场面。他必须亲手对付无法控制的、难以预测的和有暴力倾向的清华红卫兵，同时他又可能成为源自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的首冲目标。他将如何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生存下来呢？

胡锦涛在1942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至胡锦涛父亲胡静之这一辈，胡家因为1930年后期的抗日战争而开始衰落。最初，胡静之从胡锦涛祖父那里继承了一个小茶铺，是个小业主，但他的小茶铺在1950年代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没收了，于是胡静之成了一个小店员。可是，胡家的衰败对胡锦涛是一种运气，因为要不然的话，胡锦涛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带着他资本家家庭成分入党的。胡锦涛的幼年是不幸的。当他在六岁开始懂事时，淮海战役在离他家乡安徽寿县北部不远的淮海平原上打响了。大约有550,000名国民党官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其中不少人是寿县人。幼小的胡锦涛不可能不听说这些关于内战厮杀和死亡的悲惨恐怖的故事。小胡七岁时，他母亲去世了。〔8〕国家与家庭的悲剧肯定对胡锦涛的幼小心灵投下阴影，在他心里播下缺乏安全感的种子，使他渴望温暖而憎恨暴力和人类冲突。幸运的是，胡锦涛幼年生活中的损失被他父亲及姨婆刘秉霞给他带来的无限的爱所抵偿。他父亲胡静之是一个温和友善的人。根据刘秉霞所描绘，胡锦涛从小就是一个行为端正、敏感自觉的人。她说，胡锦涛从小很懂事，从不顽皮，“从不同人斗嘴，不同人吵架。”有时贪玩一点，大人在旁边稍微“哼”一下，他就马上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很快改过来。刘秉霞的描述可能出于对自己孩子的爱会有所夸张，但她很可能大体上没错。刘秉霞还说，胡锦涛象他父亲一样是个谦逊低调的孩子，不爱宣扬。有一次他被选为班主席，他也没有告诉家里人，最后还是他同学说出来的。〔9〕

因此，如果不是天生的话，那？就是童年的生活、家庭和社会环境把胡锦涛造就成为一个谨慎细心、安全感强、不爱冲突、自觉自律、勤勉上进、温和周到和举止得体的人。不利的家庭背景迫使胡锦涛为前途发展而脚踏实地地付出双倍努力。他从不炫耀自己，从无侥幸心理，并且有些早熟和牺牲精神。在大跃进时代，当他的中学同学纷纷抱怨打石子的活儿艰苦时，胡锦涛则说：“发牢骚没有好处，先干好了再说。”如果是两人抬东西，胡锦涛会把重物往自己这边挪一挪。开饭时，正在长身体的学生们会争先恐后地往饭桌前拥，而胡锦涛则总是走在后头。胡锦涛实际小心的态度也在他填报大学和专业的过程中反映出来。他很想上清华大学，但是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虽然填报了清华大学，但却填写了很少人向往的水利工程系，因为水利工程师必须放弃诱人的城市生活。多年以后，胡锦涛成了党的领导人，在1992年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但他仍然很低调，对亲戚家人一概拒绝关照。他很少在公众场合提到他的出生地和家乡，并拒绝了当地政府在重新改造他老家周围建筑时保持他老家原貌、以供参观瞻仰的建议。（10）

胡锦涛谨慎和讨人喜欢的性格很快受到共产党组织的欣赏，他在1965年年仅23岁时就被吸收入党。胡锦涛的谨慎恭谦的性格能帮助他躲过后来的政治考验和政治运动吗？对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千万不能过高估计性格对命运的影响。国家政治力量和社会大环境常常远胜于个人的政治能力和灵活性。例如，在文革初期，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无论怎样小心谨慎，都不可能躲避红卫兵的锋芒，他可以轻易被红卫兵疯狂的行动所扫荡。事实上，有的大字报已经把他提名，要他公认追随错误政治路线的罪过。（11）就在这紧要关头，北京市委组织部派遣了一个528人的庞大工作组到清华大学，接管了该校上到校长和校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政治辅导员的全部权力，这就把胡锦涛从许多即将来临的政治麻烦中解救了出来。（12）

不过，尽管胡锦涛可以尽量小心谨慎、察情行事，当学生们都积极投入到文革中时，作为政治辅导员的他不可能袖手旁观、无所事事。年轻而又积极上进的胡锦涛投入了文革并参加了清华“四·一四”派。（13）清华“四·一四”是清华红卫兵的保守派，他们捍卫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文革前十七年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自1949年以来阶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动，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好的。由于他们的不同观点，清华“四·一四”从激进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即团派中分裂出来。团派认为自1949年以来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文革的目标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从中国共产党内部清除出去。（14）胡锦涛选择加入“四·一四”派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共产党的大多数，是中共十七年路线的产物。他的信仰、经历和努力全都跟这条路线密切相关。这事实上也是邓小平的立场，难怪邓小平后来一手提拔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的经历对他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学生干部和共产党基层领导——清华学生艺术团团委书记和系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在基层工作中学会和发展了他的社交能力、组织能力和政治能力。他的清华经历奠定了他的政治哲学和人生方向。胡锦涛参与清华“四·一四”这一事实表明，到了文革期间，胡锦涛的政治思想和风格已基本形成：他是追随刘少奇和邓小平路线的典型的技术官僚。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把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来的政策说成是改革，其实这是一种误导。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政策只是试图恢复刘少奇路线，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去。他的政策实质是复兴共产党的旧政策而不是改革共产党的体制。胡锦涛的政策弄不好也是如此。唐少杰认为，在文革中，毛泽东所煽动和利用的“造反派”们要否定“十七年”，而“十七年”期间在政治和生活上受益受惠的广大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则恰恰相反，他们以“十七年”之“盾”阻挡毛泽东的“文革”之“矛”。而无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还是反文革的十七年路线，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15）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再左进，也没有让四人帮接班；邓小平再右进，也没有向六四要求民主的学生让步。胡锦涛参加清华“四·一四”的事实表明，他的基本政治思想是跟十七年一致的。他任期内的“改革”政策恐怕就是努力恢复到共产党的十七年路线、

把刘少奇邓小平的施政纲领发挥到它的极致效应而已，绝不会超越这个限度。

五、文革及其对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的影响：文革期间及文革后的胡锦涛

当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后期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失控时，胡锦涛就没有怎么参与在文革中了。他成了逍遥派。没有现有的档案档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胡锦涛在想些什么？，但我们可以想像，作为有头脑有上进心的中共党员，胡锦涛一定会密切关注文革的动向，竭力弄清楚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实质性问题。文革很可能从下述几方面对他的思想和前途产生影响。

首先，如同他的前辈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亲眼目睹了群众运动的后果及文革带来的浩劫和社会动乱。他是一个谨慎守法的人，是共产党十七年既定路线的捍卫者。他不会喜欢毛泽东阶级斗争政策和文革的激进性，也不会喜欢红卫兵造成社会动乱的好斗风格。他一定被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而威胁并产生反感。但另一方面，文革、群众运动和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操纵又充分显示了普通老百姓和公众舆论的力量，它教会了胡锦涛巧妙引导和驾驭民众思想的必要。胡锦涛是一个低调的人，但他对民众的意见和反应十分敏感。他在文革期间耳闻目睹了民众和大众民主的力量，这对他日后执政影响非浅。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水利工程师，他一定知道群众力量就象水库里的水一样：它既不能突然释放而造成洪水，也不能一味阻拦以至最终水势升高越坝成灾。

其次，文革间复杂而不可预测的、导致中共领导人纷纷下台的政治斗争向胡锦涛充分显示了中央政治生活的危险性以及韬光晦略的重要性。出生于平民家庭而资历平平，胡锦涛清楚知道他没有如何政治资本可以赌博。既然连象彭德怀、贺龙和林彪这样具有光荣历史和生涯的革命英雄老干部都会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更何况他胡锦涛这样一个平凡小辈？因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胡锦涛只会接受上级想付予他的而不会要求上级付予他所想要的。他没有政治资本，但他有政治智慧和耐心。

再者，在文革后期，胡锦涛象所有高校生一样，被派遣到落后地区去接受劳动锻炼和改造。他在1968年来到甘肃刘家峡水利电力工程枢纽工地，后来又随工作组到永登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在那里，他不仅亲眼看到而且亲身体验了中国贫苦地区农民老百姓的艰苦生活。（16）虽然刘家峡水利电力工程枢纽工地离甘肃省会兰州不远，但那里的生活工作条件在1960—1970期间是非常简陋，与北京和安徽是没法比的。如同文革中许多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胡锦涛肯定会被甘肃难以想像的恶劣的生活条件所震惊，然而这一段在社会基层简短的生活工作经历对他今后的执政是非常关键的。它使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使他确切了解了被边缘化和被遗忘了的地区和人民，也使他产生了对普通民众的感情和联系。如果没有这一段在社会最底层与最普通的工人农民一起工作的经历，胡锦涛今天也许不会充分重视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以及发展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最后，就是在甘肃，胡锦涛遇到了宋平和李登瀛，这两人在胡锦涛政治生涯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宋平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妻子陈舜瑶当时是清华大学党委付书记兼付教务长，对胡锦涛很了解。李登瀛是甘肃省委书记，是胡锦涛妻子刘永清叔叔的老战友。这两个人成了胡锦涛的政治恩师。由于他们的推荐，胡锦涛被提拔到甘肃省建设委员会，然后又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通常这是被进一步提拔到省级或中央党政机构的必经之路。（17）虽然胡锦涛跟宋平和李登瀛相遇工作的机会可能是纯属运气，但他被提升的时机却不是。由于文革在中共内部上上下下造成了接班危机，当时中共迫切要把年轻而有知识有能力的干部作为新鲜血液吸取进来，于是胡锦涛正奉其时。而且，文革中许多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厚颜无耻地丑陋表演使得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非常小心，他们对性格张扬、咄咄逼人的人比较反感，而对胡锦涛那种有凝聚力、亲和力的性格比较喜欢。他们还意识到“太子党”的问题，大

都认为要把平民家庭出生的党员纳入中央，以平衡“太子党”的力量，平息社会舆论。以其普通家庭出身和有基层工作背景以及温和、谨慎、低调和亲切的性格，胡锦涛无疑在中共许多高层领导人的眼中看好。他既在个人性格上又在党的利益层次上符合了各种标准。

六、结论

总之，“时势造英雄”的说法有其道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胡锦涛是文革的产物。文革对中共的影响可以从他的政治发展中清楚看到。如果没有文革，胡锦涛很可能不得经过漫长而缓慢的途径而获得提升，他也许在退休之前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省市地区干部或一个中央部级干部。如果没有文革把“太子党”力量大大削弱的话，胡锦涛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与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竞争，走进中南海的大门。如果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没有被文革中释放出来的难以驾驭的群众力量以及许多野心家的丑陋行径所吓倒，也许胡锦涛温和谨慎的性格不会被看得很重，而一个更有魄力和胆略的人也许会放在他今天的位置上。接下来的问题是：胡锦涛是否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最佳选择？对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提问者如何看待今天中国改革的性质与需要。假如提问者认为后江泽民时代的中国需要大刀阔斧地实行激烈改革以解决中国自毛邓时代以来日积月累的制度性问题，那么胡锦涛可能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因为他的政策风格是谨慎、温和与避免对抗的。假如提问者认为中国应该继续通过循序渐进和逐步转化而非激烈变动的方法来达到其改革的目标，那么胡锦涛可能是完成该使命的最佳人选。在中国外交领域中，情况也是一样。无论如何，胡锦涛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到中国第一号人物的成功发展之路一定会对中共各阶层干部有所启蒙和激励。胡锦涛温和友善、谨慎低调的性格会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范例和学习榜样。具有宏观思想、历史眼光和超人胆略的伟人领袖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具有非凡管理能力和处事技巧、人缘性格良好、善于化解冲突的人将主导今后的中共领导层次。

注释：

1. 例如，Lan Seckington 的“中国的新领导：‘第四代’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领导风格”（China's New Leadership: The 'Fourth Generation' Bring Their Own Style of Leadership）《共产主义和过渡政治研究》（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第19卷第4期，2003年12月（December 2003）；Zheng Yongnian & Lye Liang Fook: “精英政治和中共第四代领导人”（“Elite Politics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中国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第8卷第1、2期，2003年秋。
2. 例如，在1991年，这些人的总数是三千四百万。加上由工资由农民的税收来支付的六百万农村干部，全部干部的总数在1991年是四千四百万左右。
3. Joseph Fewsmith: “中国的领导代层转换”（“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2年秋，第25卷第4期 第23—35页。
4. Joseph Fewsmith: “中国的领导代层转换，”第23页。
5. 同上，第25、30页。
6. 同前。
7. 文思咏和任知初：《胡锦涛》，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8. 同上，第26—41页。
9. 同前，第46—47页。
10. 同前，第49—56页。
11. 同前，第90—91页。
12. 唐少杰：“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载“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一七）《华夏文

摘》2004年7月。

13. 文思咏和任知初在《胡锦涛》中写道，胡锦涛后来成了逍遥派并脱离了文革运动的主流。（第90—91页）可是，有一位学者访问过胡锦涛的校友和清华“四·一四”的成员，他们都肯定胡锦涛是清华“四·一四”的成员。

14. 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15.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第12卷，2005年第4期，第74—76页。

16. 文思咏和任知初：《胡锦涛》，第93—112页。

17. 同上，第118—126页。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往事如烟】

## 文革中的清华岁月

• 万润南 •

### ◇ 偏向绝处飞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应对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 ◇ 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而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在荒诞的后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一位青年讲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了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第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也因为我的处境，所以就格外记得。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寞，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 ◇ 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是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在，恰好100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 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 192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 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 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 1931—193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 1936—1938年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 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 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 1949—1950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 1952—1954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 1954—195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 1957—1959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 1960—196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 1981—1983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 1992年2月16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1966—1980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

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是在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一天早、中、晚三个单位的时间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贻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哇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75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环境卫生工程，实际得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XX，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 ◇ 蒯大富和胖老头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9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1961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60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疹”，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以未及文革正式开场，就先拿他们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准。他非常认真，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类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所以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光美同志无限信任和崇拜，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同志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也让另一个女人妒忌得抓狂。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才会把随便一个什么女人当成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又得到那个抓狂女人的利用和加持，就这样成了蒯司令。他们后来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的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1966年6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吐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也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自称“老贼”的段永基，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 ◇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

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关于他那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我另文再述。

#### ◇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1967年1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39岁；1970年3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27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于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89年，

我不过说了句不赞成邓小平杀人、支持赵紫阳不杀人的真话，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 ◇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一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小爬虫”，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观，说得再白一点，就是靠边站。但从远处看，有时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说，从1966年7月30日到8月2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20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4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参加并记得的，是周恩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1966年8月4日；一次是8月22日，中间8月18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挥。这三次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文革新贵”充满了敌意。我想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毛也。

话说8月4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门见山，就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23天里发生的大情小事，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发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我的肺被气炸了N次。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董老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微微的了，但讲的话实在。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老后来对文革理解没有？

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辨。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



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8月22日夜晩，周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8月4日周的博闻强记，到8月18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8月22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 ◇ 我的学长胡锦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

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332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帮，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

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

#### ◇ 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8月4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的不知“红袖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也学起了江青，声调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后来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付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其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实确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就会起鸡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全身加了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睛。我很听话。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议：“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一直到串联回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我在心里让那个妖精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再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会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政治实在是一种“脏话”，有“洁癖”的人很难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过人之处，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

◇ “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醇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四九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

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结果是欲盖弥彰，反而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1966年6月24日，那天应当明定为“校耻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被打伤了，为了避免挨打，奋力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还死了人。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承嫻。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 ◇ 空望月儿明

从七零年到七八年，我在承德前后生活了八年。人生的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本来应该是充满绚丽和璀璨，因为普遍的大环境、因为独特的个人境遇，在我却是一段晦暗的记忆。那八年当中，我先是在铁路车辆段当工人，后来在铁路中学当老师。当刘涛南下西去（承德在北京东北方向），留下我一人家徒四壁、冷冷清清，可说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能给我精神安慰的，一是读书、二是收听来自太空的“靡靡之音”。

你们听说过梁绍良和周友康吗？他们是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也是美国之音的时事播音员。梁绍良的音色，不亚于中央台的夏青。收听他们播讲的时事经纬，是我一天生活中的大事。记得他们评论林彪事件后的中国社会，用“上层僵持着，中层瘫痪了，下层灰心了”来概括，我觉得言简意赅，说得极为准确。我也喜欢VOA的音乐节目。记得听过一首吉他曲“Aloha”，伴随着夏威夷海水的涛声，每一声叮咚都轻软地敲打着你的心。仿佛吉他歌手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你的心弦。我也喜欢美国的乡村音乐，那里有美国早期拓荒者艰难辛苦的吟唱，也有西部牛仔追逐绿草水源的高亢。对我来说，这都仿佛是从月宫里飘下来的仙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偶尔也能收听到苏联的广播，播音员浓重的俄罗斯腔，让人大倒胃口。后来我读到美国CIA关于对外宣传的条例，其中有一条是：流利地使用对方国家的语言是有效宣传的前提，因为任何人对借用他们的语言都会有反感。起码在这方面，美国人比俄国人更明白，也更有效。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在海外遇到中文流利的周友康，他还在VOA工作，这回是他和我面对面的访谈。我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嗨，久违了，老朋友。我还向他打听梁绍良，他说梁是老一辈的，已经退休了。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